



安徽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朱汉民

董喜宁◎著

孔庙祭祀研究

Kongmiao
Jis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董喜宁◎著

孔庙祭祀研究

Kongmiao
Jis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庙祭祀研究 / 董喜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朱汉民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4509 - 8

I. ①孔… II. ①董… III. ①孔庙—祭祀—研究

IV. ①K892. 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744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特邀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李 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492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许又声		
副	主	任	李友志	
成	员	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	主任	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 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 李 兵

总 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作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惘、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的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

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

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忬、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規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

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序 一

陈戍国

公元2006年（丙戌），董喜宁君攻读博士学位之初，予建议董君以“孔庙祭祀研究”为题，考虑其博士学位论文之撰写。董君籍贯为山东。而山东乃孔孟之乡，关系中华礼乐文明至鉅；由山东治礼学者研究孔庙祭祀，自较妥当。

《明史·钱唐传》：

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①

钱、程之言何由而发？据钱唐本传，皆由不肯附和洪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天下不必通祀”而发也。做人、齐家、治国依孔孟之道为好，一味鼓吹“阶级斗争”不行。依其道，怀其人，礼之应当，故钱惟明谓祭孔为通祀，为报本之礼，斯言得之。

朱洪武当年不但限制孔庙春秋释奠，而且禁止祭祀孟轲。“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讎’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

^①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1—3982页。

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馀荣。’”^①就洪武帝而言，天下唯我独尊，岂容臣民视为“草芥”与“寇讎”？钱惟明不畏强暴，敢为孟轲死而独抒己见。“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②朱洪武以错杀臣民著称，然而终于未杀钱唐。钱惟明实在幸运。而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先生叨朱洪武之光，以修《孟子节文》之“伟业”赢得难脱干系之骂名，可叹可笑！

日居月诸，物换星移。朱洪武之后，孔子孟子，至圣亚圣，孔庙祭祀，至20世纪连遭厄运。诬蔑孔子“和民众并无关系”者有之，力主毁孔庙、废祭孔者有之，诋“孔学名高实秕糠”者有之，欲打倒而后快者大有人在。朱洪武以及刘三吾先生实有后嗣。然而以刘三吾先生奉命修《孟子节文》不足法者亦有之。吾辈平民百姓，自有孔孟观，尝为祭孔大典之适度回归而喝彩，亦尝为洗刷若干名人强加于孔孟之罪名而努力，为孔子学院走向世界而叫好。^③关于孔孟祭祀，予亦常著文表示意见^④，则董君博士学位论文已惠予引用矣，盖不以为谬乎？

予于董君博士学位论文，曾大加赞赏。自公元2006年（丙戌）至今（甲午），董君以近八年之功，研究孔庙祭祀之源流、礼典之内涵、仪式之变迁，并提出若干问题引发思考。既不要求未来之祀典完全抛弃历史，又不赞成祭孔照搬先例。不必虚夸，其中确有真知灼见。亦不必讳言，其中犹有可商焉。

201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光临曲阜，召开座谈会，讲话简短精辟而重要。他既指出孔子思想“唯心、保守”之一面，又肯定其中进步合理之精华，言及“忠孝节义”，言及“仁义礼智”，指示弘扬传统美德，鼓励传播礼仪文化。既如此，传统文化研究有用，孔子研究有价值，礼学研究亦自有价值可言，盍可忽诸？

不久以前，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决定将董君博士学位论文

①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2页。

② 同上。

③ 请参见拙撰《中国礼文学史·先秦秦汉卷》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对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所谓文化革命的检讨”，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8页。

④ 请看拙作《古礼今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孔庙祭祀研究》纳入资助出版之规划。正式出版在望，董君索序于予。此序之作不当辞，爰书数语如上。董君勉乎哉！

是为序。

公元 2014 年 2 月 21 日于湖南大学

序 二

姜广辉

董喜宁所著《孔庙祭祀研究》即将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言，我觉得义不容辞，答应下来。

中国古代，信仰多元，祭祀的对象很多。你到北京去看，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等等，这些场所都是皇帝祭祀的地方，为皇帝一人所垄断，别人不能在此进行祭祀，如若不然，便是“僭礼”。而“僭礼”的实质是对现有等级秩序的破坏。祭天等活动，虽然有儒者赞襄参与，其实他们不过是“相礼”和“执事”的身份。

古代，平民百姓家家供奉祖宗神位，逢年过节都要祭祀自己的祖先。

至于公共的祭祀场所和建筑，大家会首先想到佛教的寺庙。佛教寺庙大多选址精心，建筑壮美，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许多名山中都有佛国大刹。其次是道教的宫观，一些名山中也常建有巍峨的紫殿仙宫。再次便是儒家的文庙（又称孔庙），文庙除了北京、曲阜、南京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没有佛教、道教的庙宇壮丽。虽然如此，传统社会对文庙祭祀的重视程度，却又在佛教、道教之上，以致清人裕泰说：“礼，莫重于祭。今天下庙学丁祭，其尤重者也。”（裕泰《文庙丁祭谱序》）丁祭，就是传统社会在春、秋仲月的上丁日所举行的祭孔大典，它寄寓着中国人的价值理想和人文信仰，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说到此，我突然想到了岳麓山。在岳麓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一个不甚大的山上，自上而下，有道教的云麓仙宫、佛教的麓山古寺、儒家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实行“左庙右学”的规制，左半部分就是文庙。2013年在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岳麓书院恢复了中断近百年的祭孔典礼。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破除迷信”、“五四”精神的教育。在我们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眼中，以上这些场所不过是“封建文化”的残余。我们在青年时期，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与这些“封建文化”的残余做过最彻底的“决裂”。像曲阜孔庙这种地方，虽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也是很大的。我后来进入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那时曾专门派人去曲阜孔府、孔庙抄写档案，并加以研究，称之为“变天账”。

“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此时，学术界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儒学研究，曲阜地区也恢复了孔庙祭祀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了在曲阜举行的国际儒学会议，那时我的思想中“五四”情结很重，所以当时在与一位西方学者交谈时，很自然地提出“世界改变儒学”的说法，可是那位西方学者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主张“儒学改变世界”。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使我长时间地对儒学的未来发展加以思考。后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许多问题的观察角度也不同了。

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金，即社会步入小康社会时，社会将爆发信仰危机。在21世纪初，根据2004年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金。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767美元。在最近的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明显进入了快车道，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然而在文化上却向着在有些人看来完全是“复古”“倒退”的方向发展！各地佛寺、道观香烟缭绕，人们从四面八方来朝拜，很多儒家的文庙也恢复了祭祀孔子的活动。

20世纪初“废除尊孔读经”之时，曾经积极倡导革新的梁启超就表示了担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梁氏所言之“中学”主要是就经学而言。从梁启超到今天差不多有一百年了，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今天由一些享有盛名的学者点校的礼书错得一塌糊涂，曲阜孔庙祭祀时三牲祭品竟放颠倒，其他祭品也错乱摆放，台湾学者龚鹏程嘲讽道：“将牛尾巴猪屁股对着孔子像。”听到批评后，曲阜一些人仍不服气，认为人家是“恶意挑衅，目的是要与我们大陆争‘正统’”。我真替他们脸红。

所以，当董喜宁选择《孔庙祭祀研究》这个课题时，我就极表支持。大陆学者真的要对这些问题好好研究，补补课。

董喜宁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师承关系，他的老师陈戍国，是岳麓书院的教授，也是当今国内首屈一指的礼学专家，著有六卷本的《中国礼制史》。我对他的学问十分敬佩。陈戍国的老师是沈文倬，曾被称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著有《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等书。沈文倬的老师是曹元弼，曾为晚清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闭门著书，著有《礼经学》《礼经校释》《复礼堂文集》等书。曹元弼的老师是黄以周，黄以周专力治经，尤精“三礼”，著有《礼书通故》等书。黄以周的父亲兼老师黄式三，也是一代名儒，著有《论语后案》等书，晚年好言礼，著有《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等篇。从黄式三、黄以周、曹元弼、沈文倬，再到陈戍国，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陈戍国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董喜宁便是其弟子中的佼佼者。

《孔庙祭祀研究》，全书四十多万字，资料详赡，观点允当、文字流畅典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研究著作，具有规范和改进当代孔庙祭祀仪式的重要参考价值。

此书是董喜宁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定稿的。岳麓书院的硕士、博士论文水平总体上是不错的，董喜宁的博士论文更是其中翘楚。我曾说，我到岳麓书院六年，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当今高校录用人才，门坎很高，不仅要看录用对象的学位证书，还要看他们读大学本科时的学校是否为“211”和“985”大学，这使得一些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变得很焦虑，怕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而董喜宁凭她的优秀博士论文，越过了这道鸿沟，被湖南师范大学选中录用。所以，我平时经常以董喜宁为典范，鼓励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努力做好论文。

如今董喜宁的《孔庙祭祀研究》就要出版，我相信此书出版后，学界会承认它的学术研究贡献，高校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也会从中受到激励和鼓舞。

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2014年5月12日